

# 西方“9·11文学”研究：方法、争鸣与反思

但汉松

**内容提要** 近五年来，英美学界的“9·11文学”研究已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本文着重考察了这段时期国外此类研究的主要视角、方法和论点，并从“归零地”叙事、后殖民批判与叙事伦理这三个角度归纳并阐释当前已有研究的内部争鸣。在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差异性和分歧点进行分析梳理后，本文试图提炼“9·11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亟需反思和商榷的几个核心议题，并为未来的研究走向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 9·11文学 创伤 后殖民 叙事伦理

2011年是西方学界“9·11文学”研究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出版了两部相关的专著，分别是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的《倒塌之后：9·11之后的美国文学》（*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after 9/11*）和马丁·兰德尔（Martin Randall）的《9·11和恐怖文学》（*9/11 and the Literature of Terror*）。同年，美国权威学术期刊《现代小说研究》（*Modern Fiction Studies*）推出了“9·11文学”的秋季刊专号，刊登了八篇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集中研讨了这一事件对于新世纪文学和批评理论的深远影响。在十周年前夕，维罗尼克·布拉加德（Véronique Bragard）等人还主编出版了论文集《描绘9·11：论漫画、文学、电影和戏剧中的再现》（*Portraying 9/11: Essays on Representations in Comics, Literature, Film and Theatre*）。此后两年，同类的研究继续跟进。2012年分别出版了伊娃·科瓦尔（Ewa Kowal）的专著《早期“后9·11”小说中的图像事件：2001年9月11日以后关于恐怖的文学再现》（*The Image-event in the Early Post-9/11 Novel: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Terror After September 11*）、乔治安娜·巴里塔（Georgiana Banita）的专著《谋划正义：9·11以后的叙事伦理和文学文化》（*Plotting Justice: Narrative Ethics and Literary Culture After 9/11*）以及台湾学者廖培真（Pei-chen Liao）的专著《“后”9·11南亚离散小说：神秘的恐怖》（*“Post”-9/11 South Asian Diasporic Fiction: Uncanny Terror*）。2013年，安·克尼斯顿（Ann Keniston）等人主编的论文集《9·11以后的文学》（*Literature After 9/11*）出版，进一步凸显了这个学术话题的火热。

当然,这倒不是说之前的“9·11文学”研究完全处于失语状态,而是说在相关性、系统性和论争性上,近三年出现了较明显的进展。2011年之前,直接针对“9·11小说”这个特定文类的研究以期刊论文居多,专著并不多见,代表性的成果仅有克里斯蒂安·维斯鲁伊斯(Kristiaan Versluys)的《突如其来:9月11日和小说》(*Out of the Blue: September 11 and the Novel*, 2009)、阿瑟·布拉德利(Arthur Bradley)的《新无神主义小说:虚构、哲学和9·11以后的论争》(*The New Atheist Novel: Fiction, Philosophy and Polemic After 9/11*, 2010)和北德克萨斯大学的学术期刊《小说研究》(*Studies in the Novel*)在2004年秋季刊的专号“恐怖主义和后现代小说”(Terrorism and the Postmodern Novel)。在“9·11”以后,此领域的研究更多的是延续了文学与暴力、恐怖主义和创伤的已有研究范式,基地组织恐怖袭击恰好印证了这类文学研究的预见性。这里最有影响的著作,也许是玛格丽特·斯坎兰(Margaret Scanlan)出版于“9·11”当年的《谋划恐怖:当代虚构中的小说家和恐怖主义者》(*Plotting Terror: Novelists and Terrorist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1)。需要指出,斯坎兰的研究完成于2001年之前,主要考察的是1979年到1998年当代小说中涉及文化冲突、暴力、政治和大众媒体的议题,所讨论的作家主要是拉什迪、德里罗、莱辛、罗斯和库切等。这部原本并不显眼的专著因为“9·11事件”而获得广泛关注,巴里塔等人的书名甚至可以说是对这部专著的某种影射。紧随其后的是弗兰克·伦屈齐亚(Frank Lentricchia)的《艺术之罪和恐怖》(*Crimes of Art and Terror*, 2003)和特里·伊格勒顿(Terry Eagleton)的《神圣的恐怖》(*Holy Terror*, 2005)。和斯坎兰不同,这两位学者已无法绕开“后9·11”的思想文化语境去谈论文学与恐怖的关系。在文本分析上,他们依旧未针对“9·11”后出版的小说,而是将恐怖与暴力与文学的关系放在浪漫主义的传统中进行追溯。

为什么西方学界针对“9·11文学”的专门研究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滞后呢?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原因是,与西方知识分子针对“9·11事件”的迅速反应不同,文学评论家所依赖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只有当“9·11小说”成规模的出现,才可能对之展开专门的研究。对通俗的类型小说(如间谍小说、政治惊悚小说等)而言,“9·11”是一个绝好的题材,它几乎融合了政治、阴谋、暴力、恐怖等全部的类型小说流行元素。事实上,恐怖分子劫持飞机袭击美国的情节早在2001年之前就已在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这样的畅销书作家的书中预演过。但是,此类流行大众读物鱼龙混杂,它们很难撑得起“9·11小说”这样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更难以获得学院派文学评论家们的青睐。真正意义上的“9·11小说”——如果我们坚持高眉文学和低眉

文学的划分的话——其实姗姗来迟。笔者此处只是开列一个不完全的清单，但基本上涵盖了目前较有分量的“9·11小说”作品：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博格比德（Frédéric Beigbeder）的《世界之窗》（*Windows on the World*, 2003）、哈立德·胡塞尼（Khaled Hosseini）的《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 2003）、阿特·斯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的绘图小说《在无楼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No Towers*, 2004）、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2004）、乔纳森·萨弗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的《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2005）、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小丑萨利玛》（*Shalimar the Clown*, 2005）、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星期六》（*Saturday*, 2005）、丽恩·莎农·舒瓦茨（Lynne Sharon Schwartz）的《墙上书》（*The Writing on the Wall*, 2005）、杰斯·沃特斯（Jess Waters）的《零》（*The Zero*, 2006）、肯·卡尔福斯（Ken Kalfus）的《这个国家特有的混乱》（*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 2006）、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恐怖分子》（*Terrorist*, 2006）、杰伊·麦金纳尼（Jay McInerney）的《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 2006）、克莱尔·马苏德（Claire Messud）的《帝王的孩子》（*The Emperor's Children*, 2006）、雷诺兹·普莱斯（Reynolds Price）的《好牧师的儿子》（*The Good Priest's Son*, 2006）、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2007）、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坠落之人》（*Falling Man*, 2007）、乔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的《地之国》（*Netherland*, 2008）、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2009）、艾米·瓦尔德曼（Amy Waldman）的《屈服》（*The Submission*, 2011）和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放血尖端》（*Bleeding Edge*, 2013）。

这些作品有的来自文坛名宿（如厄普代克、罗斯、品钦、德里罗等），有的则是出自新晋作家（如胡塞尼、福尔、麦凯恩、瓦尔德曼等）。其中，沃特斯的《零》和卡尔福斯的《这个国家特有的混乱》是首次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的两部“9·11小说”，此时距离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五年。直到2009年，美国的最高文学奖才首次颁发给了“9·11小说”，这部作品就是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评论界对这些作品褒贬不一，抱怨关于“9·11”的伟大主题小说迟迟未诞生，甚至认为“就算是其中最出色的小说，也不过是泛泛而谈”<sup>①</sup>。不仅如此，针对“9·11小说”的已有

① Laura Miller, "Why We Haven't Seen a Great 9/11 Novel." Salon.com Sept.2011.Web.21 Feb.2014.< [http://www.salon.com/2011/09/10/9\\_11\\_and\\_the\\_novel/](http://www.salon.com/2011/09/10/9_11_and_the_novel/) >

研究也还存在着选题失衡的现象——部分作品被过度讨论，而其他作品则乏人问津。在《现代小说研究》为2011年秋季专刊组稿时，编辑部共收到七十篇论文，其中专论德里罗的《下坠的人》就有十四篇之多，而研究福尔的《特别响，非常近》的有十二篇。<sup>①</sup>

以文学的特有方式面对、思考、阐释和再现“9·11事件”，是当代美国小说家责无旁贷的使命，但此类小说创作的困难和评论的失衡，却体现了“9·11文学”本身的某种内在矛盾与困境。

首先，“9·11小说”的可写性一直受到广泛的讨论与质疑，它既涉及到小说美学自身的限度问题，也关乎人们对这种小说的伦理审查。与战后“大屠杀文学”（或“见证文学”）面临的处境相似，关于“9·11”的虚构文学作品是要去再现一个民族所遭受的巨大历史创伤，而这种人类极限境遇的事件本身具有某种不可言说性和不可再现性。让文学为双子塔中的遇难者作见证，这似乎如同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一样值得商榷。即使当小说虚构对象是那些纽约恐怖袭击的幸存者时，小说家依然需要谨记“创伤研究”的一个法则，即创伤是拒绝言说的，因此小说只能言说这种“不可言说性”。而在“后9·11”时代，美国保守主义更是认为“归零地”具有某种纯粹的严肃性，它足以终结后现代的反讽。<sup>②</sup>“9·11小说”就和其他体裁的艺术形式（如电影和戏剧）一样，被认为不能真正触及那些在燃烧的高楼中等待死亡的悲剧核心，虚构的艺术再现于是变成了对这种巨大严肃性的一种轻薄。但对于那些一直批判“美国例外主义”和“爱国主义正确”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9·11小说”对于纽约这个悲情城市的过度渲染构成了另一种伦理不公，“因为我们一直说‘9·11’遇难者的死亡意义更加重大，[其他人的]死亡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吗？”<sup>③</sup>

其次，“9·11文学”本身的定义也存在颇多争议。虽然“9·11小说”这样的术语常见诸各类媒体，亚马逊网上书店也专辟了此类小说的目录，但对于什么是真正的“9·11小说”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如果按照一种宽泛的定义，将所有在作品中提及纽约恐怖袭击或反恐战争的小说都归入“9·11小说”之列，那么我们将面临这样一种评论的尴尬：在很多作品中“9·11”仅是一个点缀性的存在，它要么只是蜻蜓点水地被作为时代背景提及（如保罗·奥斯特的《布鲁克林的荒唐事》），要么以含沙射影的方

① John N.Duvall and Robert P.Marzec, "Narrating 9/11", in *MFS* 57.3 (2011), p.394.

② Rosenblatt, Roger. "The Age of Irony Comes to an End." *Time* Sept.2001.Web.21 Feb.2014.< <http://www.time.com/time/covers/1101010924/esroger.html>>

③ Laura Miller, "Why We Haven't Seen a Great 9/11 Novel".

式出现在小说中无足轻重的段落里（如珍妮弗·伊根的《恶棍来访》）。如果以是否提及或暗示“9·11”来作为定义标准，“9·11小说”将成为过度泛化的文学类别而失去单独讨论的意义。而与此同时，部分未提及此事件或故事背景与之相距甚远的作品，却因为其主题与恐怖主义暴力的相关性而被认为是小说家对“9·11事件”的一种曲折性再现（如罗斯的《反美阴谋》和麦卡锡的《路》）。尽管小说家公开否认自己的作品是对于“后9·11”时代的寓言化表达，但评论家却坚持认为，这种“去9·11化”的“9·11小说”恰恰体现了作者对此事件的政治态度和美学主张。巴里塔甚至认为，“时至今日，对那个事件完全不做任何批评审视的当代文学作品是根本无法想象的”。<sup>①</sup>

“9·11小说”创作和研究中的这种困难，其实深刻对应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德里达认为人们在谈论“9·11”时“并不知道自已说的是什么”<sup>②</sup>，这个饱含争议和隐喻的事件构成了新世纪一个宏大问题域的中心点，以此轴射出各种复杂深远的思想议题。以乔姆斯基、詹明信、赛义德等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恐怖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建构，它服务于美国意识形态和中东政治的需要，主张追问“9·11的前历史”与美国自身的责任。阿甘本从施密特的“例外状态”和福柯的“生命政治”出发，以“牲人”（homo sacer）这一独特的政治哲学概念来批判“反恐战争”和《爱国者法案》对法律的悬置和对生命的侵犯。齐泽克和鲍德里亚则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9·11”归咎于全球化世界市场与基于种族、宗教、民族和语言的特殊主义之间的冲突，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他者”以死亡为象征性武器，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抗争。因此，可以说当代西方思想界围绕“9·11”所谈论的，绝不仅仅是基地组织与美国霸权主义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早已借此引申到关于生命、死亡、语言的限度、影像政治、新无神论、日常生活、暴力、恐怖主义、国家主权、公民不服从、全球化正义等一系列相关而发散的议题。也许十几年后，人们对于双子塔燃烧和倒塌的噩梦已逐渐消退，但“9·11”之后触发的全球反恐战争却持续地发酵，从阿富汗和伊拉克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从真实的战场进入到虚拟的互联网空间，成为这个时代日常生活中无可摆脱的语境。毫不夸张地说，“9·11”之后世界的一切已经变得不同，今天无论是思想的话语还是文学的虚构，都很难真正摆脱“后9·11”时代的影响。

“9·11文学”研究当然无意成为西方左右思想交锋的附庸，它研究的对象并非这一事件本身，而是对这个事件的再现（representation）。当然，这种研究对象的间离并不意味着“9·11文学”研究可以摆脱思想的语境。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西方知识分子对

① Georgiana Banita. *Plotting Justice: Narrative Ethics and Literary Culture After 9/11*. U of Nebraska P, 2012. p.12.

② Richard Gray. *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9/11*. Malden, MA: Wiley, 2011. p.5.

“9·11”的争论和阐释，这个事件的意义才逐渐摆脱简单的爱国与悲悼的范畴，得以在历史的连续体中得以深刻呈现，并影响到小说家对于“9·11”的文学虚构和文学评论家对“9·11小说”的价值判断。总体来说，当前国外的研究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以韦尔思鲁伊斯、考夫曼（Linda S.Kauffman）和卡普兰（E. Ann Kaplan）等人为代表的创伤研究。他们将“9·11”与战争文学、犹太大屠杀见证文学中的创伤传统结合起来，考察政治空间下暴力和恐怖对人性的戕害和自我疗救的可能；第二，以巴里塔、伦屈齐亚和斯坎兰（Margaret Scanlan）等人为代表的艺术与恐怖-暴力的历史研究。他们将恐怖-暴力与文学的关系放在浪漫主义和二十世纪暴力史的传统中进行追溯，认为艺术家自我想象的原型正是集暴力与反叛于一身的“路西法”（Lucifer），面对现代性的“大恶”（即对人类个体性的剥夺与异化），艺术家需要以暴力方式突破规则，以实现对社会政治的介入和影响；第三，以兰达尔（Martin Randall）和格雷为代表的后殖民式研究，从跨国主义和伦理批评的角度反思“9·11文学”的再现问题，批判以美国创伤为主要视角的灾难叙事模式，呼吁将纽约“归零地”置换为多国族、多宗教和多文化的小说叙事，以去中心化和混杂性的文学想象帮助各国读者更好地认识文化“他者”。

我们不妨以近年来三本“9·11文学”研究专著为例，更为具体地讨论以上三种研究范式的异同和观点交锋。比利时学者韦尔思鲁伊斯的《突如其来：9月11日和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卡普兰等人的“创伤研究”模式的一次批判性总结。作者梳理了创伤与叙事的基本关系，指出“9·11”是“一个极限事件，它粉碎了文化中的象征之源，打垮了意义生成和语义学的正常过程”<sup>①</sup>，因此被认为是“语言边界之外的”创伤性事件。但“9·11事件”的创伤效果一方面阻隔了语言的意指功能，另一方面个体却需要凭借叙述（narrative）和指号过程（semiosis）来寻求创伤的治愈。所以，“9·11小说”的创伤叙事就不仅仅是一种再现，而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文本，它旨在通过讲述来缓解焦虑，甚至修复创伤所导致的语言断链。（*Out of the Blue*: 5）而且，作为一次“被全球见证和分享的间接体验”，“9·11事件”所导致的创伤亦是全球性的，所有人都“需要去理解、去解释和去恢复”（*Out of the Blue*: 6）。韦尔思鲁伊斯认为，这种创伤的巨大性和受众的普通性带来了“9·11”叙事的一个悖论，即这种创伤叙事的聚焦点必须极小，必须施加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个体，由此才能用语言来讲述最大范围的灾难。（*Out of the Blue*: 12）“9·11小说”由此成为了一种提喻式想

① Kristiaan Versluys. *Out of the Blue: September 11 and the Novel*.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9. p.2.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象,曼哈顿的那次灾难是日常生活中的断裂事件,它帮助普通人意识到家庭和信仰的可贵。作者认为,这类“爱国主义或基督教复兴题材的“9·11小说”,虽然销售量巨大,但文学价值上却乏善可陈”。(*Out of the Blue*: 18)为了避免这种将“9·11”的悲剧性叙述为一种“缺乏真正悲悼的胜利主义”,韦尔思鲁伊斯建议小说家去谋求一种“诗学伦理转向”(poethic turn),即让诗学与伦理学合二为一,既在小说中充分表现出对语言本身限度的自省,同时对“9·11”中的那些“他者”做出一种“补偿性想象”(*Out of the Blue*: 13-14)。书中以斯皮格尔曼的《在无楼的阴影下》和福尔的《特别响,非常近》为例分析了语言在“9·11事件”中的叙事限度,并将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奉为诗学伦理转向中实现“他者”视角的典范之作。

如果说韦尔思鲁伊斯还只是停留在“创伤理论”的框架内,批判性地总结了“9·11小说”中“创伤书写”的得与失,那么英国学者格雷的《倒塌之后:9·11之后的美国文学》则以更为战斗的姿态提出了“何为好的9·11小说”的问题,从而将“9·11文学”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结合了起来。格雷首先区别了悲悼(mourning)和忧郁(melancholia),指出美国社会主流对于“9·11”的反应是属于病态的后者,而在悲悼中体现出了一一种政治上的失败。<sup>①</sup>他认为美国作家对于“9·11”的书写也显得过于沉溺于一种讲述“不可能的讲述”的悖论美学中。格雷尖锐批评了德里罗的《下坠之人》和福尔的《特别响,非常近》,认为它们坠入了“私人化”和“家庭化”的陷阱,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想象力的麻痹”(*After the Fall*: 22)。格雷断言:“只有混杂(the hybrid)才是唯一可能的空间,从而让不同文化真正进入,让对创伤的见证真正得以发生。这样的小说拒绝沉默的挑战,它们运用的话语是真正地混交而成,具有过渡性,从而可以颠覆主流评论中的对立性语言,如我们和他们,西方和东方,基督教和穆斯林。”(*After the Fall*: 14)作者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他认为理想的“9·11小说”就应该是各种文化、族裔的声音交汇和争鸣的场所,麦金纳尼《美好生活》的失败就在于未能提供这样一种多元化的视角。格雷借用霍米巴巴关于“民族是一种叙事”的看法,认为“9·11小说”应该努力去拥抱混杂性,解构二元对立,让“9·11”中凸显的文化身份冲突变为一种操演和竞争。(*After the Fall*: 39)在这种后殖民理论的规定性(prescriptive)批评模式下,“9·11小说”的价值首要体现在叙事视角背后的政治立场,因而《恐怖分子》《地之国》和《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等小说就成为了“9·11文学”的范本。

① Richard Gray. *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9/11*. p.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近年来“9·11文学”研究的第三个案例，是澳大利亚学者巴里塔的《谋划正义：9·11以后的叙事伦理和文学文化》。这本书从叙事伦理的视角出发，也许在更大程度上呼应了韦尔思鲁伊斯倡导的“诗学伦理转向”，并同时避免了格雷对“9·11小说”过于政治化的解读策略。与后殖民批评所强调的跨文化、跨宗教的他者维度不同，本书作者视图在历史的维度去寻找和建构“9·11小说”叙事的伦理。巴里塔首先认为，主流的“9·11”叙事的最大弊端是缺乏历史和政治的语境，尤其是忽略了冷战结束这一坐标性事件，而创伤理论又过于关注个人经历的历时传递，忽视了集体认同问题，未能继承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sup>①</sup> 巴里塔之所以强调小说家应该像德里罗、品钦和莫里森那样在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之后走向历史维度的虚构写作（如《地下世界》和《梅森和迪克逊》），是因为“知晓历史的可能性”对于当下灾难的记忆或见证都异常重要。<sup>②</sup> “9·11小说”应该以寓言式历史叙事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政治霸权视为现当代历史创伤的根源，以奥斯维辛、广岛和“9·11”为轴线，揭示国家权力和启蒙理性中的结构性野蛮。跳脱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的“9·11”叙事，只会带来多元文化主义的衰微和宗派主义（sectarianism）的重新崛起，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伦理问题。巴里塔还注意到，早期“9·11文学”研究缺乏理论性，针对的仅仅是一些描述日常生活创伤的作品，所以她建议引入多萝西·J·黑尔（Dorothy J.Hale）的文学伦理学批评<sup>③</sup>。众所周知，文学伦理学的第一大流派是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创立的，她相信文学阅读是为了获取适用于文学文本之外世界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第二种文学伦理学代表人物是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他认为文学有着文本内部自给自足的伦理规范，这种文本内部的伦理，更多地指向对于文本复杂性和异质性的一种遵从。巴里塔认为，“9·11小说”深刻地浸润于历史现实中，它必然同时体现了努斯鲍姆和米勒这两种不同范式的文学伦理，而黑尔的新伦理学非常合适于阐释“9·11文学”，因为它既呼吁读者在阅读之外的政治行动，也强调文本内部的社会价值的建构。这种伦理价值的取向，其实是一种对于知识霸权的怀疑，对于认知不确定性的拥抱。《谋划正义》的核心观点是文学伦理学“对他者意识的激发”（the otherness provocation），但巴里塔意识到仅仅在小说虚构中培养对于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好感是肤浅而无效的，这种伦理指向的他者生产应该是在认识论层面的。难能可贵的是，巴里塔并非单纯挪用黑尔的新文学伦理学观点，而是认为应超越詹姆斯

① Georgiana Banita. *Plotting Justice: Narrative Ethics and Literary Culture After 9/11*. p.3.

② Georgiana Banita. *Plotting Justice: Narrative Ethics and Literary Culture After 9/11*. p.4.

③ Georgiana Banita. *Plotting Justice: Narrative Ethics and Literary Culture After 9/11*. p.21.



小说式的伦理（这种伦理无需明确声明，只需要读者或小说人物去停止对他者进行决断），应该在“后9·11小说”中去实践这种伦理，这其中包括在认识论上对自我的设限，以及对带有偏见的他者认知的反省和补救。

通过比较分析韦尔思鲁伊斯、格雷和巴里塔的研究，我们基本可以勾勒出目前“9·11文学”的一些基本方向和分歧所在。韦尔思鲁伊斯抓住了创伤叙事和创伤研究在“9·11文学”中的流弊，但他对于“诗学伦理转向”却仍然没能在叙事格调和美学意义上解释“9·11小说”有别于大屠杀见证文学的特殊性，这恐怕也是他所倍加推崇的《恐怖分子》被大多数文学评论家视为厄普代克最失败作品的原因。格雷突破了美国“9·11小说”批评的一些禁忌，大胆指出已有“9·11小说”的失败多半是一种政治失败，可是仅仅用多元文化或移民视角去讲述“9·11”就可以避免创伤式“9·11小说”的温情泛滥吗？事实上，《追风筝的人》和《拉哈尔茶馆的陌生人》代表的是另一种“家庭化”倾向，剔除它们与《美好生活》的视角之差，前者在小说美学上的开拓并不多。巴里塔的研究似乎避免了前面两个学者的问题，以带有社会实践性的文学伦理来取代后殖民批评的身份政治，同时又强调这种理论建构只是针对“9·11文学”的一种路径尝试。

“9·11文学”研究的这种分歧和矛盾体现了这个文学范畴本身的不稳定性，“9·11”本身的意义也仍然在今天不断地变化和生成中，对此事件进行历史性反思恐怕需要长时间的沉淀。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应该以规定性的批评来指定何为“好的9·11小说”，而要以更为兼收并蓄的心态来看待和评价“9·11文学”的发展。既观照它与战后见证文学和创伤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同时更看重它自身特有的思想文化语境，提炼这个文学类别处于发展和形成之中的形式美学和主题特征。同时，笔者也反对以单一的创伤文学或后殖民批判的视角来审视“9·11小说”，要像朗西埃那样，不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体系或话语的控制，而是从“可感范畴的分配”上视之为不同逻辑话语间的协商和对抗，从而消解传统上政治与审美的对立。由此，我们才可以从文本外部的社会历史空间和内部的语言审美空间同时切入，探究“后9·11”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对话可能。

\*本文获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3CWW021）和2011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11WWC012）资助。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责任编辑：胡 朗